

者为了弄清如意馆与启祥宫的位置也颇费周折，经过多方核实，方才明了，启祥宫，现在紫禁城内已不存其名。它在明代原名未央宫，兴献皇帝诞生于此，其子朱厚熜（嘉靖）登极后，为了纪念他的生父，于嘉靖十四年改未央宫为启祥宫⁶⁴。顺治入关后沿用，同治年间更名太极殿。启祥宫前门距养心殿后东门——吉祥门不过百步，距后西门——如意门更近，对弘历极为方便，在万几之余出养心殿后如意门，隔一条六、七米宽的横街即可达启祥宫视察现场，指示技艺，命匠师制出更适宜于他本人趣味的内廷样式的绘画和工艺品。这种消遣作乐，也是酷爱书画、玉器、牙竹雕刻的弘历的一种艺术享受。他与画家、工艺家的联系在他的御制诗文中也有所记述，《清档》也不乏记载。

如意馆、启祥宫的特殊地位，表现在管理上有别于其它作坊，如怡亲王、内大臣海望较多干预，首领太监也直传谕旨。负责管理的官员为司库（正六品）刘山久、图拉、郎正培等人。

乾隆朝设两所画院，这也是我国皇家画院史上所罕见的建制。两者各自独立又互为配合，画家也可以相互调剂，根据任务的轻重缓急，随时调整借用。画院处、如意馆两个机构有若干画室。如乾隆元年画院处除在圆明园芰荷香外，还于深柳读书处设一“古玩片画室”，张为邦等四人曾在那里作画一两年之久。在如意馆行走的郎世宁，在其海淀住处也有自己的画室。乾隆皇帝分给他学徒五人，在那里学画。这实际上是画室兼教室了。造办处还专设油画房，供画油画之用。

乾隆朝画院处，由员外郎陈枚、七品官赫达子等官员管理，十几名画家在内行走，经常接受弘历谕旨作画。虽与宋徽宗时画学与画院结合在一起的画院有所不同，却与五代西蜀、南唐、敦煌张仪潮画院以及南宋画院类似。这种具有满族特点的双轨制画院，还不能网罗内廷所有御用画家。当时画作尚存，有画样人二名，负责设计工艺品草样，珐琅处也掌握了一批画家或画工，绘画艺术水平较高。清朝历代皇帝都非常喜爱珐琅工艺，康熙时内廷设珐琅厂（有时称“作”或“处”），专制皇帝所用的珐琅器，雍、乾、嘉三朝继之，并得到巨大发展。珐琅作中也有画珐琅的画家在内行走，有时也称“画院”。画珐琅画家多由广东或江南其它地方的官员保荐，进入珐琅厂。其人数仅次于如意馆、画院处。如意馆的郎世宁也画过珐琅画。画院处邹文玉则调入珐琅处，专绘画珐琅。反之，珐琅处行走的罗福颐曾借调给画院处在斋宫画《百古图》。实际上，造办处属下画家集中的地点共有三处，即：画院处、如意馆和珐琅作。当然，三处所属画家可互相调剂，分工合作，但机构重迭，不易管理，画家调来调去亦有不便之处。终于在乾隆二十七年调画院处七品官赫达塞协同花善管理珐琅处，同时将所有画院处（春宇舒和）的画家亦归并到珐琅处“一体行走”，事实上是将画院处主管官员、画家一起并于珐琅处，而兼顾绘画图册或年画的任务。著名画家则留在如意馆，逐步过渡到单一的画院——如意馆（启祥宫）。从《清档》来看，画院处的档目截止于乾隆三十二年，同时，在该年档中，画院处之名又散见于记事录档内，乾隆三十三年记事录中尚可偶见⁶⁵。从此以后，画院之职责由如意馆承担，珐琅处只象征性地担负绘制少量年画和某些紧急的绘画工作。乾隆朝画院由初年名实兼备的建制又一次进入无画院之名而有画院之实的如意馆时代，这应以乾隆二十八年为起点，嘉、道、咸继之，并走向衰微。同治元年（1862年）之后，又于延禧宫以北的北五所西端改建如意馆画院，直至1911年清亡。

乾隆朝还有一处喇嘛教画院——中正殿，它与造办处有密切联系，其性质与元代梵像提举司相似，承担皇家宗教绘画与雕塑等工作。在建制上是一处特殊机构，与画院处、如意馆在工作上有所配合，附记于此。